◆印象记

“新民歌旗手”匡荣归（中）

唐志平

1959年第4期《人民文学》封面

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匡荣归的诗歌可谓红极一时，1959年4月的《人民文学》曾以个人专栏的形式，一次性集中刊发其歌颂人民群众、歌颂人民公社的新民歌体诗作12首，这在当时实属罕见。同期刊发作品的作家还有后来蜚声文坛的张天翼、柯岩和赵树理等。新民歌运动作为文学史上一场带着浓郁政治气息的新文学运动，其时非常引人注目。大文豪郭沫若读了匡荣归这组令人振奋的作品后，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，赞扬说：“你以你的民歌，开了一代诗风。”并称赞他是“新民歌旗手”。据郭老在信中介绍，毛泽东主席读过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匡诗后，曾称赞“匡诗有奇妙的构思，有准确的比喻，有鲜明的形象，有大胆的幻想”。

匡荣归先生在世时，经常拿出那封郭沫若的亲笔信向大家炫耀，本人就看到过好几次。他还多次说过有人愿意出价两万元收购这封信做文物收藏，但他一直没答应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封信后来却不知所踪。

郭沫若还于1959年6月28日给他赠诗一首：“杉树生成直又高，叶尖密密利如刀。何人识得匡君性，不是狂来不是骄。”郭老读了“映山红，朵朵红，关公骑马我骑龙。关公挥刀破五关，我拿锄头砍山峰”一诗后，曾击节赞赏，说：“在过去的民歌中，都是传唱‘观音骑马我骑龙’，这其实传错了，观音哪来的马？她都是坐莲花台，但这个错几千年来一直没人纠正，今天匡荣归终于把它纠正过来了，可喜可贺！以后传唱‘关公骑马我骑龙’就符合实际了。”据说，匡老就诗歌创作问题还与何其芳、郭小川等大诗人有过书信交往。

按理说，以匡荣归这样的文采和才华，在当时谋个正式工作应该不成问题。但据说就因为他的狂傲与目中无人，曾经错失一次良机。

那是上世纪60年代，匡荣归的新民歌体诗作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受到郭沫若乃至毛主席的赞扬后，名气大振。当时的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急需选任一名《工农兵文艺》编辑。省群艺馆的两位老师奉命来到邵东，欲登门拜访，请他“出山”。在县文化部门的一位领导陪同下，三人来到黄陂桥杉树坪匡荣归的住所“天野草堂”。当天下雨，时近中午，匡荣归尚闭门在床上睡大觉。县里的领导敲了好几遍门，屋内才传来回应。这位领导隔着窗户说明来意，匡未急于开门，而是说：“请我去省里工作可以，但我要出一副对子，你们对上来我便开门。”不知匡荣归具体出的什么上联，来者是否对上。后来门是开了，只见这个“天野草堂”也太名副其实了：那是一间年久失修的老土坯房，低矮、暗黑、潮湿，室内凌乱不堪，全部家具就是一张老木板床、一个柜子、几条板凳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，另有几麻袋的书籍报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。

此时恰逢午餐时间，匡荣归便留三位客人一起就餐，因当时杉树坪街上没有饭店，他亲自炒了几个鸡蛋和一碗白菜。客人见四人吃饭，才三个鸡蛋，迟迟没有动筷。这时匡荣归打趣地说：“不用抢，不用争，三个鸡蛋我来分。一人一个正合适，粗茶淡饭情也真。老匡呷饭不用菜，开水泡饭更省心。”当然，这只是坊间传闻，未必完全属实。但最终匡荣归没上省城当编辑倒是事实，据说那个位置后来被湘乡农民小说作家刘勇获得。通过打拼，刘勇后来担任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全国劳动模范。性格决定命运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说匡荣归狂傲，那是不争的事实。上世纪90年代，县里文艺界一开会，只要匡荣归在场，便会口若悬河，高谈阔论，不外乎是吹嘘自己。他到当时的《邵东报》送稿，先是声称自己又有新诗在国际国内获得大奖，在美国和港台的刊物发表一首诗，获得100甚至800美金云云（其实全是无稽之谈，当然也没人当真）；接着狠批副刊编辑“有眼不识泰山”“不发我匡某的作品”；然后用因得帕金森症而颤颤巍巍的手掏出几页写得歪歪斜斜的诗稿，让编辑工工整整地帮忙誊抄以便下次“照发”。

匡荣归孜孜不倦地耕耘在诗歌的园圃中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然而，匡荣归为诗歌创作所付出的艰辛代价却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匡荣归由于写了一些针砭时弊的诗文，再加之他恃才傲物，口无遮掩，因而三次蒙冤入狱，使得他后半生穷困潦倒，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。他孑身一人，生活拮据，晚年基本上是依靠文朋诗友的资助与微薄的稿酬，以及政府按五保户标准发放的钱粮来维持生活，个中艰辛可想而知。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是充实的，按当今时髦的说法，就叫做“痛并快乐着”。

（唐志平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，现任邵东市文联副主席、作家协会主席，出版有作品集《乡风四味》）

曾令超作品

◆专家评介

曾令超在京作品研讨会记录摘要

曾洪晖 整理

2019年4月22日，由中国盲文出版社、求真出版社联合举办的“曾令超作品研讨会”在北京中国盲文图书馆举行。

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，专门打来电话给会议主持人张伟（中国盲文出版社社长），转达了对曾令超的祝福和问候。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中宣部、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及湖南省、邵阳市、新宁县的有关领导、专家。现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发言摘要如下：

曾镇南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著名评论家）：曾令超的写作不会像年轻一代有些盲人作家会电脑写作，他不会电脑写作，他用自制的格子写，他的爱人蒋妹抄出来，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非常艰辛。他所从事的作家的劳动是一种特殊的、艰难的劳动。同时，我认为也是一种特殊的光荣的劳动，他就是为了在黑暗事业当中，找到光明，要在人生跋涉当中不断攀上新的高度。

我觉得他的散文写得好，诗歌也写得好，小说写得很好看，很好读，充满了生活气息不说，小说有故事，有人物，而且有很多曲折，既有小说的元素，又有时代意义，又有独特的人生感悟。他这些书是很好的，艺术上是站得住的，不说是文学高峰吧，也应是优秀之作。

许正明（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、著名评论家）：我国现有盲人1700多万，是最需要关爱和帮助的困难群体，他们虽然存在视觉的障碍，但是渴望与正常人一样工作、生活。同样在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，曾令超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敢于追逐梦想，勇于实现梦想的优秀代表。他虽然不幸负伤致盲，却不畏逆境自强不息，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进行文学创作，依仗心灵的视力观察世界，描写世界，创作出版了十多部充满真挚感情的优秀作品，令人非常钦佩。曾老师把崇高的价值、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，他的作品自始至终，贯穿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，颂扬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彰显着满满正能量，可谓胸中有大义，心里有人民，肩头有责任，笔下有乾坤，这是中华民族最优秀，最可贵的品质，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和道德的滋养。

吴义勤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，中国出版集团党委书记、著名评论家）：曾老师坚守高尚的艺术理想和高涨的创作热情，坚持正确的价值方向，不远离实际生活，从真实的、本原的情感出发，与众不同的落笔视角拓展了文学表现力。他的创作对真善美和光明的发现与追求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对人性的信仰，赋予了文学非常温暖的、有温度的品质，而这样的文学，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特别需要的。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，曾令超老师的创作，既有文学的意义，又有超越文学的意义。他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榜样，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独特的贡献。

徐可（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）：从作品中看得出曾老师人物塑造上的变化，而且变化非常大，从最开始的单纯化到后来逐渐转向了丰满、丰富、多元、生动和鲜活。可以说这表现了曾老师在文学创作上不断的变化、不断的发展、不断的成熟、不断的进步。他后来的作品塑造人物手法非常娴熟，人物形象非常自然，非常立体，非常丰满。可以说他的作品紧扣住时代的发展步伐，也反映了时代的变迁。

梁瑞郴（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国家一级作家）：失明之后，曾令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体验生活、观察生活，所以他的作品没有脱离现实，与这个时代没有脱节。他的作品，从第一部作品到现在，是在一部一部进步的，越写越好。他始终追求生命的长度，很多人都是有初心而不能坚持到底，我觉得曾令超同志，能够一以贯之坚持到底。

李一鸣（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、著名评论家）：曾令超的创作是有根的创作，他的起点就是亲身观察生活，从现实出发，深入概括社会生活，努力揭示社会生活本像和内在本质，讲述人间真相，敞开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。这就是密切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现实，关切人类生存途径和精神成长，这样的现实感，不是虚幻的，不是飘拂的，是深入的，是有根的。

他的创作是关注人的存在的。文学是开掘人心、人性，展现人类的处境，关切人类的发展，这是一切优秀文学创作的所在，也是曾令超现实主义创作的聚焦所在。文学的本质是同情，曾令超始终以同情、悲悯之心关注人的现实命运，重视人的存在和死亡、毅力和尊严、权利和责任、事业和生活，始终关切人的心灵世界，关切人的冲突与挣扎、希望与忧患、热爱与憎恨、欢乐与痛苦、需求与诉求，真正使他的作品，他的创作成为弱者的伟业。他的创作是一种有责任创作。他善于在对立与矛盾中叙事，面对时代，他能够用辩证的，改变现实的这样一种心态去描写。他的写作是有艺术追求的创作。他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写小说就是写人物，优秀作家就是看对文学史贡献了几个人物，一个或者几个。他特别擅长女性形象的塑造，几部小说中着力于女性形象的塑造，我们也看到他的作品中都有一个残疾人家庭成员的背景，他的作品具有独特性、标识性。

◆作者发言

我与我的《青石湾》

林日新

去年九月，我的长篇小说《青石湾》在中国致公出版社公开出版。

可以说，《青石湾》属半自传体小说，是一部描写山村知识青年成长励志的长篇小说。它浓缩了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追求、奋斗、失落、成功的追梦之路，浓缩了他不弃不舍、永不言败的人生过程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高考落榜青年石哲成为了寻找“诗与远方”，极力躲婚，跟随乡亲们到雪峰山里做了一名“小毛货郎”，半途意外落单，只身独闯侗乡，在山重水复之际巧遇老货郎六爷爷，开始了一段特殊的奇妙旅程；回乡后，他有幸被聘为民办教师，在教书生涯中，他经历了所有乡村民办教师经历过的迷茫、失落和成功，饱受人间的酸甜苦辣：事业上的艰难，同事的冷眼和挖苦，领导的压制等。八年后，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师范学校的“民师生”，尔后转为公办教师，他的人生才展开了崭新的一页：教学上得心应手，写作上也成绩斐然，没过几年就幸运地晋升为中级职称教师，后来还通过努力评上了高级教师，成为同行中的佼佼者。

“青石湾”的原型是我的故乡，这不假，但它却只是我文学的故乡，又是寄寓我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思想历练与情感生活的地方。石哲成的原型是我，这也不假，但他却只是艺术化的“我”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中的“我”。云南的作家刘孙恒在《书话青石湾》中就曾写道：“这是林日新老师的故事吗？那描写的场景是不是某个真实地方的映射？”同事刘中豪老师则在《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的诗和远方》中替我解释了：“作者的现实生活与石哲成的励志经历大同小异，只是婚姻完全不同。作者的婚姻一帆风顺，夫妻恩爱，相敬如宾，美满幸福，可石哲成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却十分波折。”

《青石湾》最初开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我刚走向讲台时。小说经过反复修改、补充、完善，至正式出版，时间跨度达三十多年，与我的人生同步成长，我也曾自我调侃，这是“三十年磨一剑”。作为一个相伴了三十年的“孩子”，我对她是十分珍爱的，因为她是我三十年心血凝结而成的，她是一朵“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瑰丽文学之花”（邵阳学院刘运喜教授在书评中所赞）。

也许，不少读者对有关“毛货郎”那充满山乡传奇色彩的文字特别喜欢，不少老师读者则对有关教书育人的故事格外欣赏，而我的老同学们则对男主人公与初恋情感波折情有独钟，我自己则被主人公三十年如一日坚持文学梦想的行动所打动。

现在，我清醒地认识到：《青石湾》让我圆了作家梦，但人生之路还很长，文学之路还将继续。我会经常用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来激励自己，争取写出新的“青石湾”，写出新的“石哲成”。

（林日新，武冈市人，中学语文高级教师，湖南省作协会员，出版有随笔集《教育笔谈》、长篇小说《青石湾》）